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第 42 期（民國 92 年 12 月）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 葛壯，《宗教與近代上海社會的變遷》

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9 年 9 月。410 頁。

吳姿穎<sup>\*</sup>

本書作者葛壯於 1992 年參與《上海宗教史》的撰寫工作之後，以《上海宗教史》的研究作為基礎，加入更多自己的意見，進一步完成《宗教與近代上海社會的變遷》一書。在《上海宗教史》出版之前，學界並沒有討論上海地區宗教發展史的重要專著出版，《上海宗教史》為第一本全面的、綜合的上海地區宗教發展的研究書籍。葛壯先生寫作《宗教與近代上海社會的變遷》時，《上海宗教史》為一本相當重要的參考著作。

本書的呈現方式並非以時間、或者單一宗教來作為章節安排的順序，而是以主題作為討論的中心，構成全書敘述的骨幹。內容分為三大部分：上篇敘近代上海大舞台上的特殊角色，著重於描寫近代上海在開埠初期，宗教人物在上海這個大舞台上所扮演的特殊角色。中篇述社會政治風雨滌蕩下的宗教演變，配合中國與上海的政治、社會等大環境的變遷，來描寫宗教人物在這段時期所從事的活動，包括小刀會與太平天國的衝擊、庚子拳亂等教案、民國前期上海宗教界的振興氣象，以及從抗戰爆發到解放前夕的上海宗教界。下篇論開放的城市和開放的宗教，著重於描寫近代上海宗教的多元景象，部份內容與上篇及中篇的論述有相互重疊處。作者以另外一章來敘述俄僑東正教與猶太教。

\* 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班研究生

作者的上篇序言強調，上海社會的多元變化，使各個宗教能在這個大舞台上紛紛登場，包括佛教、道教、伊斯蘭教、天主教、基督教、猶太教、東正教等世界著名宗教，甚至還包括錫克教、祆教等地區性宗教。雖然有的宗教只是亮相而已，但大多數能在近百年來的上海呈現出各自的風采（頁3-4）。作者希望讀者在閱讀之後，能夠對近代上海宗教文化的發展概貌，及社會變遷的歷史軌跡，能獲得更多的了解（頁5）。作者在點出近代上海宗教活動的多元特色之後，認為各種宗教所具有的種種社會功能及其社會影響，不能作簡單的否定或肯定的論斷（頁5）。

本書上篇共有五章。第一章「城市淨土的開拓人」，約略描述上海生活環境的複雜與混亂，並從而指出由於廣大社會下層市民的需求，分布於上海的各種佛廟、道觀、教堂與清真寺，成為人們洗滌靈魂與驅逐愁苦心境的去處。從某個意義上來講，上海各宗教界人士，可說是扮演了「城市淨土開拓人」的角色。例如，佛教當中最盛行的淨土宗，只需唸十聲阿彌陀佛，就可以往生西方極樂淨土，顯然對生活於現實社會苦海當中的市民，具有莫大的吸引力（頁11）。除了佛教之外，道教、伊斯蘭教、天主教、基督教在上海這個移民城市，也發展得蓬勃而興盛。

上海獨特的移民社會具有宗教蓬勃的基本因素，因為信眾是宗教事業蓬勃所需要的基本條件。作者敘述各種宗教興盛的概況，佛寺、道觀、教堂與清真寺紛紛興建，以及許多宗教人物的種種活動，均為宗教興盛的例證。然而，作者的論述僅止於佛寺、道觀、教堂與清真寺等建築硬體設備的完成；雖也可以看到許多宗教人物的叱吒風雲，但對於廣大市民的參與宗教活動，卻未見之於接下來的論述當中。

第二、三、五章主要敘述傳教士在上海傳教所扮演的角色。作者認為傳教士在近代上海社會變遷中，扮演了西學東漸傳播者的角色。他們為西學傳播投入了相當大的心力。在第二章「文化橋樑的建築師」，作者舉出了上海作為近代中國傳播西學重要的中心，主要是由於傳教士的貢獻，並舉出許多

西書中譯的成果。作者賦予這些西書極高的評價，認為初期傳教士所出版的書籍雖以宗教類為主，但宗教之外的書籍之重要性，也不容忽視。例如，創立於 1845 年的墨海書館，在中西交流史上留下了「開創性的歷史紀錄」（頁 35）。

此外，西學東漸對於近代中國的歷史意義，更重要的是結合中外學者從事翻譯西書的工作，造就培養了王韜、李善蘭等一批最早在近代上海社會嶄露頭角的新型知識分子（頁 42）。然而，作者提及參與翻譯西書的人物，多僅止於他們對於西書翻譯的成果，對於他們個人的發展與時代背景的關聯，卻沒有完整的討論。例如王韜與李善蘭等，當時都是沒有科舉功名的人，屬於抑鬱不得志者，似乎並不具有帶動社會潮流的影響力。他們的工作在當時或者是後來上海社會變遷當中，究竟產生了什麼樣的影響，值得作者關注。

讀者於此認識到當時教會譯介西書的貢獻及其重要性。作者認為開創性的翻譯工作，即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然而，這些西書如何在當時上海社會，甚至在整個中國社會中傳播，以及是否能引起整個社會的廣泛注意與閱讀，甚至成為社會變遷的推動因素等重要議題，並沒有在這個章節中討論到。作者的目標是要探討社會變遷，可惜卻對這些傳教士介紹的西書是否在當時中國社會上引起共鳴，沒有作深入的討論。

除了傳教士的工作之外，作者以很少的篇幅舉出佛教界以及伊斯蘭教界人士，在「客觀上扮演了文化橋樑的效果」。例如，自日本留學歸國、專治佛學的學子賈豐臻等人，使國人加深對佛教的了解。近代中日兩國的文化交流，絕大部份是通過佛教人士的努力而得以不斷拓展，明顯地提高上海佛學研究水準，甚至使某些在中國已經絕響千年的佛教宗派重新弘傳開來（頁 52）。但僅僅不到三頁的敘述，簡略到難以相信佛教與伊斯蘭教起了「文化橋樑」的作用。簡單的論述卻得出了「意義宏偉」的結論，是作者寫作此書的一貫風格。

第三章「扶危助難的慈善家」與第五章「教育衛生的先行者」，著重於

描寫西方傳教士在上海地區所興辦的慈善機構、學校與醫院等。作者認為各個宗教團體都有屬於自己的社會慈善與公益事業，只是在規模與影響上有所區別。而這種慈善事業的興辦，本身是宗教界藉以在社會上立足、發展的有效途徑或手段。上海開埠的最初二十年當中，天主教的發展歷史與慈善活動緊緊地聯繫在一起，而慈善事業的開展，無論從原始目的來考慮，還是從所獲致的效果來評估，都是隨傳教這根指揮棒而起舞的（頁 60）。

儘管作者認為傳教士所做的宗教事業都是為傳教而服務，但他們當中的大部份人對於「愛」的付出與實踐，對整個上海社會轉型與歷史變遷，仍然具有積極有益的正面效應。接下來作者提到，上海的慈善事業在十九世紀中葉之後，由天主教獨領風騷。不過，跨越二十世紀之後，尤其到民國時期，無論慈善事業的規模、機構和社會影響等各方面看來，已由佛教取代。慈善事業的興盛何以由天主教居首轉而為佛教？轉捩點究竟何在？這與上海，甚至整個中國大環境的社會變遷，又有什麼關係？作者於陳述結果之後，卻沒有交代轉折的過程，不免令人感到相當可惜。

教會人士設置學校的初衷，也是希望藉由教育達到傳教的目的，因此早期的教會學校以教授宗教為主。作者提到，由於中國社會對於西學看法的改變，教會學校的學子已經不僅僅是貧苦人家的子弟，也有了富戶家庭的子女。課程的內容也以西學的世俗科目為主，教會學校的宗教色彩因而明顯淡化。作者對於這種轉變的解釋為：「宗教教育已完成了其單純而充當福音佈道工具的歷史使命，步上專業化地相對發展的路子，也只是時間上的問題了。」這種解釋顯現了歷史發展有其必然性，然而解釋此一必然性過於簡單，並不能滿足讀者。

作者認為宗教界人士與政治必然具有不可分割的關係，在第四章「從事政治的宗教徒」當中，列舉了許多參與政治的宗教界人士。首先提到的就是西方傳教士在上海租界所產生的影響力，作者形容在不平等條約之下，肩負宗教重任的傳教士，不自覺地以頤指氣使的主人自居，為列強在華加強與鞏

固其侵略基礎，提供了最有效與直接的服務。雖然作者強調不可一竿子打翻一船人，但仍然顯現出對於西方傳教士的政治偏見：在帝國主義的旗幟之下，即使傳教活動，也是以功利作為主要的目標。

對於佛教徒與伊斯蘭教徒的政治活動，作者著墨無多。特別應該注意的是，作者認為：「近代上海宗教界在社會政治活動中的集體或個人的亮相，即是宗教適應社會的直接反應。」然而，這樣的描述很難看出上海宗教界對於整個上海社會變遷所產生的影響。作者對於個人政治活動的描述，的確是叱吒風雲，但叱吒風雲之餘，又在上海的社會變遷當中，具有什麼樣的意義，卻沒有詳細的描述。作者在書中展現了批判西方傳教士的民族主義觀點，以及歌頌佛教徒、伊斯蘭教徒的愛國行為。

第八章「民國前期上海宗教界的振興氣象」，論述民國成立後，因為政治體制的徹底變動所帶來的萬象更新。新中國在經濟與文化等各方面，都步入一個前所未有的振興與發展時期，上海作為全國經濟文化中心，更是欣欣向榮。不僅基督教以此作為契機，佛教、道教與伊斯蘭教也獲得了不同程度的發展。作者判斷各宗教興盛發展的重要論點，是以佛寺、道觀、清真寺數量的增加，以及佛教、道教、伊斯蘭教組織的增加為主。作者特別意識到中國基督徒的覺醒心態，認為他們「對帝國主義在華的耀武揚威，同樣表示堅決反對的態度」（頁 229）。換言之，中國基督徒已經認識到，教會唯有認同中國人民才有前途。

第九章「從抗戰爆發到解放前夕的申城宗教界」，致力於描寫宗教界的個人在大時代的變遷當中，對於新環境所做的回應。包括在抗戰期間致力於救死扶傷的和尚、穆斯林的愛國壯舉、基督徒的中國心等等。最後寫到了宗教界面臨支持共產黨或者是國民黨的困惑與抉擇。這個部份基本上著重於宗教界菁英的個人描繪，與本書的主題「上海的社會變遷」沒有太大的關係。

本書的第三個部份，所言的內容與前兩大部份重疊甚多，不必重複介紹。值得一提的是第十一章的內容，敘述俄僑在上海社會所形成的東正教信仰，

以及猶太人在上海地區形成的猶太社區。不過，作者點明這兩個宗教僅屬於這些移民的宗教，並沒有在中國落地生根，所以對於整個上海地區的中國社會變遷，並沒有長期的影響。

上述各項重點可以看出，作者寫作本書時，力求廣博、面面俱到，各個宗教活動多少都能提到。閱讀本書的確如作者於序言中所說：「使讀者對於近代上海宗教活動有概論性的了解」。然而，筆者認為由於力求廣博，使作者的論述失去焦點，缺乏問題意識，許多見解未能進一步論證，相當可惜。例如，本書在第一章就提供了相當重要的見解：「上海獨特的移民社會造就了宗教蓬勃的基本因素」。為了凸顯近代上海各種宗教興盛的概況，作者舉出佛寺、道觀、教堂與清真寺等興建，以及許多宗教人物種種的活動作為例證。筆者同意信眾的確是宗教事業蓬勃所需要的基本條件，佛寺、道觀、教堂與清真寺的興建也需要民眾的支持。然而，宗教建築以及宗教組織的增加，如何與宗教信仰建立必然的關係，廣大的市民如何接受並參與宗教等等應該進一步思考的問題，都沒有能夠展開討論。因而我們無法從此書了解究竟民眾參與上海宗教活動的實際情況如何，也不知道宗教在上海人民的心目中究竟有多重要。

本書的第二個部份所述，大體上隨著時代的發展。這個部份概述整個社會與政治發展當中的宗教活動，討論各種宗教在大時代中，對於政治與社會的發展所做出的不同回應，強調的重點仍然是上海社會宗教界發展的蓬勃與多元。但若讀者想從本書了解各個宗教不同的活動，在民間所產生的實際影響為何，不免會感到失望。作者所強調的，仍然以個別的宗教界菁英之活動為主，忽略了廣大信徒對於宗教活動的參與。

與西方傳入的天主教與基督教相比較，在中國本土發展已久的道教與佛教活動，雖不是本書探討的重點，但作者於論述時，往往簡單而又模糊，卻得出「意義宏偉」的結論。論述過於簡化的問題，也不只出現於探討佛教、道教、伊斯蘭教等宗教之上。作者雖運用大量篇幅討論天主教與基督教，也

同樣有論述不周的缺點。例如，在第七章「社會排拒下的宗教發展」中，提到了十九世紀中葉至後期，全國教會人士無不驚喜地發現，各教區無論是在信眾人數上，還是從事的規模上，都有明顯的擴大。作者生動地描寫教案發生的恐怖，中國民眾對於西方外來傳教士的抗拒，以及對於教區的各種破壞，中國民眾的不理性，甚至殘害基督教或天主教的信眾。然而，我們在本書中看不到何以上海地區在過了這段時期之後，轉而對於西方宗教採取接受的態度。

儘管作者強調並無刻意褒貶任何宗教的意圖，我們卻總能從作者有關西方傳入的天主教與基督教之論述中，發現「譴責帝國主義」的意識形態。作者認為雖然大部份傳教士表現了「愛」的付出與實踐，而且對於整個社會轉型與歷史變遷關係中的上海，具有一些積極有益的正面效應，但是他仍堅持傳教士所做的一切宗教事業，最根本的原因是為傳教而服務，同時也是帝國主義的侵略工具。

書名雖然是《宗教與近代上海社會的變遷》，但論述無法呈現近代上海社會的變遷與宗教活動的發展之間有明顯而必然的關係。筆者認為書中的內容，多半為宗教界菁英的個人活動事蹟，對於上海地區整體信徒如何與這些宗教菁英互動，則語焉不詳。或許作者寫作本書，僅止於表達整個近代上海的社會變遷當中，宗教界菁英的活動，並沒有想要進一步分析宗教與廣大信徒之間的互動；此外，本書也不會觸及宗教活動在上海社會變遷的歷史當中，產生了什麼樣的阻力與助力。本書的書名若更改為《近代上海宗教菁英活動史》，則與內容更加契合。本書有許多應該加上註解的段落沒有標明清楚，也是缺失。儘管如此，本書仍然有其貢獻，讀者可從此書得知近代上海地區宗教界活動的一個概況。